

新
良
說

余英時文集

第七卷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
(上)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師範大學出版社

余英时文集

第七卷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
(上)

余英时 著
沈志佳 编

Wenhua Pinglun yu Zhongguo Qinghuai (Sha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责任编辑：汤文辉 李琳 邓宇

封面设计：刘凇

版式设计：陆润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 上 / 余英时著；沈志佳编.
2 版.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余英时文集：7）
ISBN 978-7-5495-5394-5

I. ①文… II. ①余…②沈… III. ①文化学—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303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524002）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2 字数：30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2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4 000 册 定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余英时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即将面世,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友人沈志佳博士通力合作的最新成果,让我首先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但是我必须赶紧补充一句,对于志佳而言,这“感谢”二字是绝对不够用的。像前十卷一样,从集结到编定,她为这两卷文集做了无数劳心而又劳力的细致工作,她在《编者后记》中已透露此中消息。

最使我感动不安的,志佳自己的职务一向很繁重,接掌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务以后,更是如此。但是十几年来,她竟在繁忙的专业之外,硬挤出时间来,先后为我编出了十二册文集。由于志佳和我是史学界的同行,她编我的文集无论是主题的选择、分类,或系年等方面,都井然有序。因此我的作品才能够以系统性的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得到这样一位富于“理解之同情”的编者,我当然感到十分欣幸,但每一念及她的辛苦和牺牲,则又不胜其惶悚。

《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的重点各有不同,《编者后记》已予指出,这里不必重复。这部文集的最早四卷是2004年出版的,十卷本(第五至第十卷)则是2006年出版的,距今已整整七年。现在第十一、十二卷的刊行可以说是承先启后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此中原因并不难寻找:志

佳一直在收集我最近七年来的新作；她将这些新作和以前未收但性质相近的旧作聚拢在一起，新的文集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志佳告诉我：她对于第十二卷以下已有初步构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拭目以待。

这部文集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论题繁多，初看似有泛滥无归之势。因此我想简单地概括一下我的治学宗旨，以供新一代读者参考。

上接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议，我采取了下面的假定：我承认人类文化大同小异。因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通，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可以相通。但因为“小异”，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复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则特色也越显著，目前讨论得很热烈的古代“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s)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史例。在这一假定之下，我的历史研究自始即以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为最后归宿。由于文化特色无所不在，不是仅从思想或哲学一端所能掌握得住，因此我在思想之外，还要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去查看这一特色是如何体现的。但我并不把各部门完全分开讨论，而是从整体的(holistic)观点查其互相之间的关联与会通，因为文化特色往往在此关联与会通之处显现。

又由于文化特色并非一成不变之物，而必然在历史流程中逐步演变，因此我的研究也不能限于任何一个时代。大体上说，我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

上面提到，我对于中国文化特色的探求直接导源于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论。这就是说，如多数现代的中国学人一样，我的文化关怀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我深信文化之“大同”，因此对五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两大普世价值始终抱着坦然接受的态度，至今未变。但是对于很多五四知识人一方面将“科学”推至“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极

端,另一方面又将清末以来“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邓实[1877-1951]语)的态度发展到顶峰,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所以追溯到最后,我试图在传统的方方面面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色,除了历史求真之外,同时也希望脱出上述两种偏颇,而寻求一条比较顺适的中西文化会通之道。

相应与这一文化关怀,我的阅读和思考范围往往不能不越出我的教研专业,即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了突出中国的文化特色,我有时也必须引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因为文化特色只有在互相比较中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为了展示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所经历的种种危机,我甚至不能不把我的史学研究扩展到20世纪。

以上概括只是提醒读者,我的文集虽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一气呵成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预设(assumptions)、中心观念和价值关怀,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机地联系起来,包括第十一、十二两卷的文字在内。有心的读者试一披寻,当可自得之。

余英时

2013年10月27日于普林斯顿

原
序
一

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费心费力编成的。她近几年来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论著,分门别类,重新编排。这里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印行这四卷《文集》,先后也很费周章。我必须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 世纪 50 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可见这是一切治学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这两句诗来自解了。

1901 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在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很明显的,通过当时日本史学界关于“东洋史”的研究,他已

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欧洲史的分期模式。梁氏这篇论文是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学》一文同样重要。就他所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基本概念而言,他确实开拓了中国史研究的眼界,其贡献是很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而言,他却在无意中把“西方中心论”带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欧洲史分期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使许多中国新史家都相信西方史的发展形态具有普世的意义。以西方史为典型,中国史直到清末都未脱出“中古史时代”,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便明白承认:“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见第二编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期的绝对准则。现代中、西之异主要是两个文明体系之异,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中古”与“近代”之别。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化(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但是我十分不赞成“削足适履”式的比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史的全面歪曲。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变作一种历史通则,应用于俄国史的研究上面。这一强烈抗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学论著,虽然写作的时间有迟有早,大体上都是从上述的立场出发的。我诚恳地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余英时

2004年3月21日

原序二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 2004 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博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史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

入中国史的专业,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余英时

2006年元旦

目 录

第七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 1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
- 3 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谈我的“中国情怀”

到思维之路

- 11 《到思维之路》再版自序
- 14 《到思维之路》自序
- 17 学而思 思而学
- 20 变与常
- 23 合情合理 合理合情
- 27 吾道一以贯之?
- 30 主义与问题
- 33 主观、客观与思想

- 36 理未易察！
39 解开心物之争的死结
42 解“执”
45 求其放心
49 为有源头活水来
52 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55 从心灵到思想
58 肯定我们的独立思想！
61 思想的分与合
64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67 知识·思想·信仰
70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74 思维与思维方法
78 思想的继往与开来
81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文明论衡

- 89 《文明论衡》序
91 文明与野蛮
105 论进步
123 论自觉
141 论传统

157	论文化整体
-----	-------

文化评论

179	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与检讨 ——兼论今后文化运动的方向
193	五四——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运动
199	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 ——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226	我对中国问题的反省
240	中国社会重建的一点检讨
249	“文明”与“文化”释名
255	论文化超越
272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286	自我的失落与重建 ——中国现代的意义危机
292	文化的病态与复健 ——刘笑敢《两极化与分寸感》序
300	文化危机与趣味取向
311	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
337	谈中国当前的文化认同问题
342	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
353	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367	编者后记 / 沈志佳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

本书选收了我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趁这次汇集成书的机会,我对其中几篇略作了一些增删,但基本论旨并无改变。我很感谢各报刊的主编朋友们,如果不是他们的热心督促,这些文字是不可能写成的。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这一点也许应该略加说明。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像我这样早年

受中国文化陶冶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情于中国的。但是这只是文化上不能忘情,与现实政治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本书所收文字中虽间有关涉政治的部分,然而其基本立场仍是文化的。文化包含了政治,同时也超越现实政治,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

我是在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的,然后再移居到美国,以现实生活而言,我不但早已与大陆脱了节,而且和台湾更是向无渊源。70年代以后,我在学术思想上开始和台湾发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是我在台湾的访问从来没有超过两个月。从文化观点说,大陆、台湾、香港在我心中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说我的学术工作和台湾、香港关系较深,而和大陆的距离较远,那完全是由于政治现实造成的,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我的“中国情怀”只有去台湾和香港两地才有自由表达的机会。今天的情况已大有不同,“远托异国”的人也可以和大陆的学术文化界发生有实质意义的交流。这当然更增强了我们关于文化可以超越政治的信念。但是最后我愿意强调一点:本书各篇文字都是以整个文化中国为对象,而我个人所关怀的也从来便是整体中国文化的前景。因政治现实而产生的地域界线在本书中是不存在的。

余英时

1988年10月10日于普林斯顿

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谈我的“中国情怀”

《明报月刊》要出关于“中国的情怀”专页，承编者雅意，让我参加一份。我很喜欢“中国的情怀”这个动人的名称。但是什么是“中国的情怀”呢？仔细一想却不好回答，因为这不是可以通过形式化、概念化的途径来解决的知识性的问题。怀疑主义的哲学家甚至还可以问：究竟有没有“中国的情怀”呢？“中国的情怀”和其他各国的情怀到底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呢？我不想这样“煮鹤焚琴”地煞风景。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的情怀”确实是存在的——它存在于每一个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的身上。但是这种“情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却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又是无从“一言以蔽之”的。“情怀”是属于整体感受方面的事，这也许便是佛经上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屈指算来，我住在美国的时间早已超过住在中国的时间，而且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我也只能自称“美籍华裔”。但是惭愧得很，从下意识到显意识，我至今还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原来“中国人”自始即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政治概念。而我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不是西方，虽然我对西方文化优美的一面也十分欣赏。

1978年10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出国的时间已整整29年了。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部流露的时刻。但是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萦回在我脑际的却是丁令威化鹤归来的神话,那时我才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我们是代表美国官方的学术访问团体,接待我们的当然也是中国官方的学术界。接待的热情和诚恳是令人感动的,可以说做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但是既属官方交往,“官腔官话”彼此都是无法避免的。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却真感到有些“难以为怀”了。后来承接待人员的好意,让我有充分的机会和家人亲友相聚,听到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然也更加深了化鹤归来的感受。

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在中国先后旅行了整整一个月。我们的任务是访问汉代遗迹,所以足迹所至大致以“秦时明月汉时关”为主,在洛阳、西安、兰州、敦煌、昆明、成都等地各停留了两三天。在旅途中,我特别察觉到我自己的心情与同行的美国朋友迥然不同。他们所全神贯注的是怎样通过这次访问来改进他们的专题研究:或证实或修正他们已有的“工作假设”。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我虽然也有此客观的一面,但是我的心情主要是一个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从西安到敦煌这一段火车行程尤其使我神游于千载之上,时时体念到汉唐时代的祖先怎样开拓了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与美国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随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截然异趣。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意识已相当彻底地政治化了。他们透视中国史所运用的一些概念范畴,如“奴隶”、“封建”、“阶级斗争”等,对我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例如在西安霍去病墓前,我们看到著名的“马踏匈奴”的西汉石雕,但是这个石雕的正式名称却变成了“马踏匈奴奴隶